

中国古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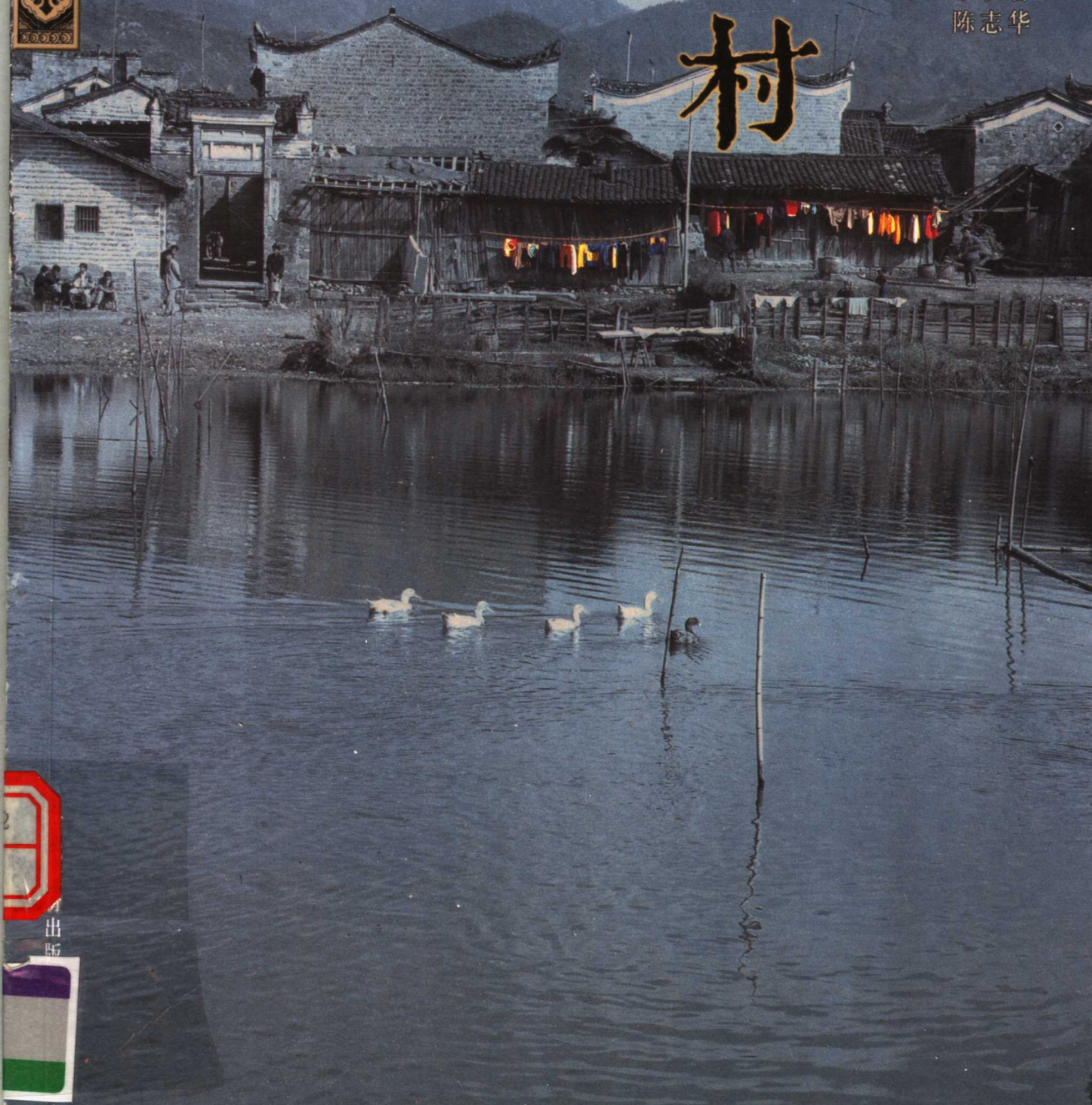
流坑村

LiuKeng

村人自称为董仲舒的后代 曾有徐霞客所描述的

“万家之市”的繁华

撰文 李秋香
陈志华



出版

中国古村落

流坑村

◎ 撰文 李秋香 陈志华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流坑村 / 李秋香, 陈志华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10

(中国古村落 / 陈志华, 楼庆西, 李秋香主编)

ISBN 7-5434-4784-3

I. 流... II. ①李...②陈... III. 乡村—建筑艺术—乐平县 IV. TU-8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023201号

书 名	流坑村
作 者	李秋香 陈志华
总 策 划	王亚民
责任编辑	周蓓 徐占博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张浩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深圳 (宝安) 新兴印刷厂
开 本	720 x 960 1 / 16
印 张	10.75
字 数	60 千字
印 数	0001 - 6000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434 - 4784 - 3 / J. 339
定 价	39. 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中国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自然农业的历史，中国的农民至今还占着人口的绝大多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基本上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基础是乡村的社会生活。在广阔的农村里，以农民为主，加上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少数在乡知识分子，一起创造了像海洋般深厚瑰丽的乡土文化。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虽然给乡土文化以巨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根扎在乡土文化里。比起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来，乡土文化是最大多数人创造的文化，为最大多数人服务。它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因此最富有人情味。乡土文化依赖于土地，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它不像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那样有强烈的趋同性，千变万化，更丰富多彩。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还没有充分开发的宝藏，没有乡土文化的中国文化史是残缺不全的，不研究乡土文化就不能真正了解我们这个民族。

乡土建筑是乡土生活的舞台和物质环境，它是乡土文化最普遍存在的、信息含量最大的组成部分。它的综合度最高，紧密联系着许多其他乡土文化要素或者甚至是它们重要的载体。不研究乡土建筑就不能完整地认识乡土文化。甚至可以说，乡土建筑研究是乡土文化系统研究的基础。

乡土建筑当然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最富有人情味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的认识价值，对建筑工作者来说，还可能有一些直接的借鉴价值。没有乡土建筑的中国建筑史也是残缺不全的。

但是，乡土建筑的价值远远没有被正确而充分地认识。一个物种的灭绝是巨大的损失，一种文化的灭绝岂不是更大的损失？大熊猫、金丝猴的保护已经是全人类关注的大事，乡土建筑却在以极



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被愚昧而专横地破坏着，我们正无可奈何地失去它们。

我们无力回天。但我们决心用全部的精神立即抢救性地做些乡土建筑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从聚落下手。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乡民生活在特定的封建家长制的社区中，所以，乡土建筑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形成聚落。和乡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相对应，作为它们的物质条件，乡土建筑包含着许多种类，有居住建筑，有礼制建筑，有崇祀建筑，有商业建筑，有公益建筑，也有文教建筑，等等。每一种建筑都是一个系统。例如宗庙，有总祠、房祠、支祠、香火堂和祖屋；例如文教建筑，有家塾、义塾、文昌（奎星）阁、文峰塔、进士牌楼，等等。这些建筑系统在聚落中形成有机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规定着聚落的结构，使它成为功能完备的整体，满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乡民们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需求，以及社会的制度性需求。打个比方，聚落好像物质的分子，分子是具备了某种物质的全部性质的最小的单元，聚落是社会的这种最小单元。我们因此以聚落作为研究乡土建筑的对象。这个研究目标本身规定了研究的基本方法，即以田野调查为主，结合文献考查。

乡土生活赋予乡土建筑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力求把乡土建筑与乡土生活联系起来研究，因此便是把乡土建筑当做乡土文化的基本部分来研究。聚落的建筑大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力求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聚落的整体上，放在各种建筑与整体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放在聚落整体以及它的各个部分与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的关系上。乡土文化不是孤立的，它是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市井文化的共同基础，和它们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乡土生活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它和一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各个生活领域也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力求在这些关系中研究乡土建筑。例如明代初年“九边”的乡土建筑随军事形势的张弛而变化，例如江南和晋中的乡土建筑在明代末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很大变化，

等等。聚落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定形的，这个定形过程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我们也希望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让我们对聚落作动态的研究。总之，我们的研究方法综合了建筑学的、史学的、民俗学的、社会学的、文化人类学的各种方法。方法的综合性是由乡土建筑固有的复杂性和外部联系的多方位性决定的。

因为我们的研究是抢救性的，所以我们不选已经闻名天下的聚落作研究课题，而去发掘一些默默无闻但很有价值的聚落。这样的选题很难：聚落要发育得成熟一些，建筑类型比较完全，建筑质量好，有家谱、碑铭之类的文献资料。当然聚落还得保存得相当完整，老的没有太大的损坏，新的又没有太多。从一个系列化的研究来说，更希望聚落在各个层次上都有类型性的变化：有纯农业村，有从农业向商业、手工业转化的村；有窑洞村，有雕梁画栋的村；有山村，有河边村；有马头墙参差的，也有吊脚楼错落的，还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等等。这样才能一步步走近中国乡土建筑的全貌，虽然这个路程非常漫长。在区分各个层次的类别和选择典型的时候，我们使用了细致的比较法。就是要找出各个聚落的特征性因子，这些因子相互之间要有可比性，要在聚落内部有本质性，要在类型之间或类型内部有普遍性。但是，近半个世纪来许多极精致的或者极有典型性村子都已被破坏，而且我们选择自由度很小，有经费原因，有交通原因，甚至还会遇到一些有意的阻挠。我们只能尽心竭力而已。

因为是丛书，我们尽量避免各本之间的重复，很注意每本的特色。特色主要来自聚落本身，在选题的时候，我们加意留心它们的特色，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再加深发掘。其次来自我们的写法，不仅尽可能选取不同的角度和重点，甚至变换文字的体裁风格。有些一般性的概括，我们放在某一本书里，其他几本里就不再反复多写。至于究竟在哪一本里写，还要看各种条件。条件之一，虽然并不是主要条件，便是篇幅。有一些已经屡屡见于过去的民居调查报告或者研究论文里的描述、分析、议论，例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之类，大多读者早就很熟悉，我们便不再罗嗦。我们追求的是写出每个聚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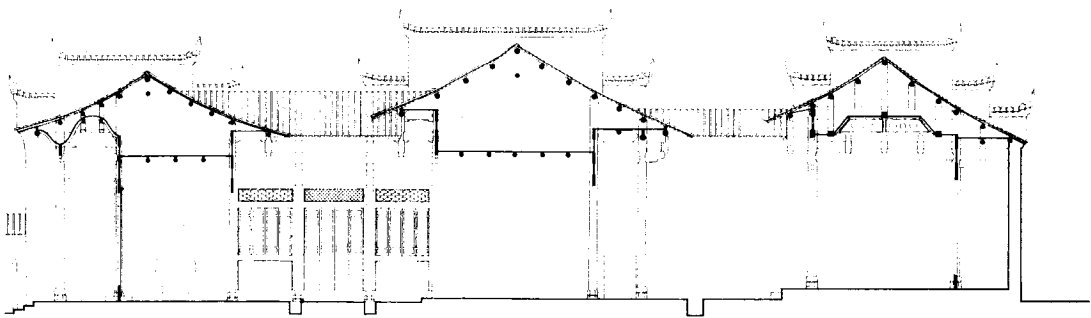
特殊性，而不是去把它纳入一般化的模子里。只有写题材的特殊性，才能多少写出一点点中国乡土建筑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挖掘题材的特殊性，是我们着手研究的切入点，要下比较大的功夫。类型性特殊性和个体性特殊性的挖掘，也都要靠细致运用比较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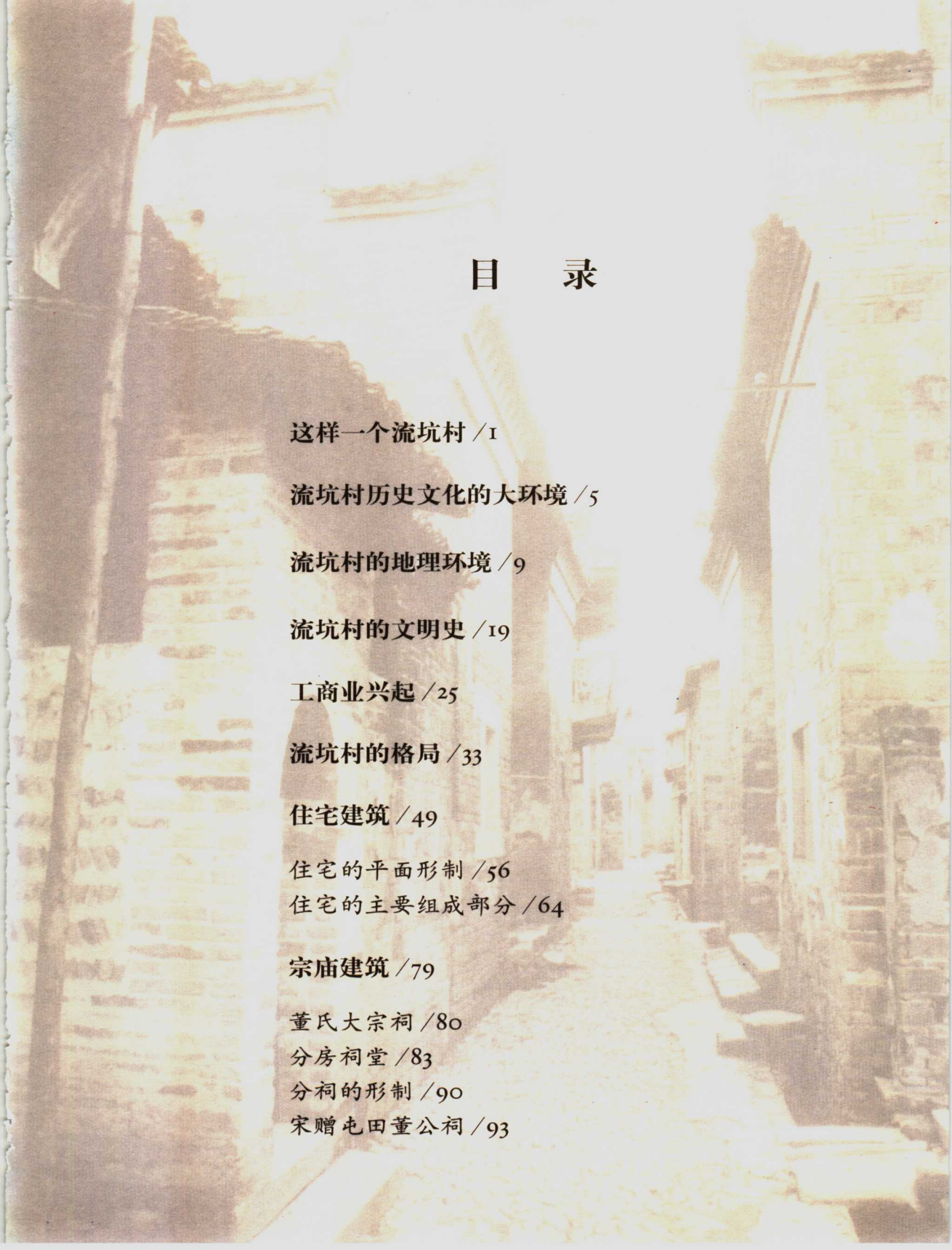
这套丛书里每一本的写作时间很短，因为我们不敢在一个题材里多耽搁，怕的是这里花功夫精雕细刻，那里已拆毁了多少个极有价值的村子。为了和拆毁比速度，我们只好贪快贪多，抢一个是一个，好在调查研究永远只能嫌少而不会嫌多。工作有点粗糙，但顾不得了，请读者理解原谅吧！

虽然我们只能从汪洋大海中取得小小一勺水，这勺水毕竟带着海洋的全部滋味。希望我们的这套丛书能够引起读者们对乡土建筑的兴趣，有更多的人乐于也来研究它们，进而能有选择地保护其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使它们免于彻底干净地毁灭。

陈志华

1998年春





目 录

这样一个流坑村 / 1

流坑村历史文化的大环境 / 5

流坑村的地理环境 / 9

流坑村的文明史 / 19

工商业兴起 / 25

流坑村的格局 / 33

住宅建筑 / 49

住宅的平面形制 / 56

住宅的主要组成部分 /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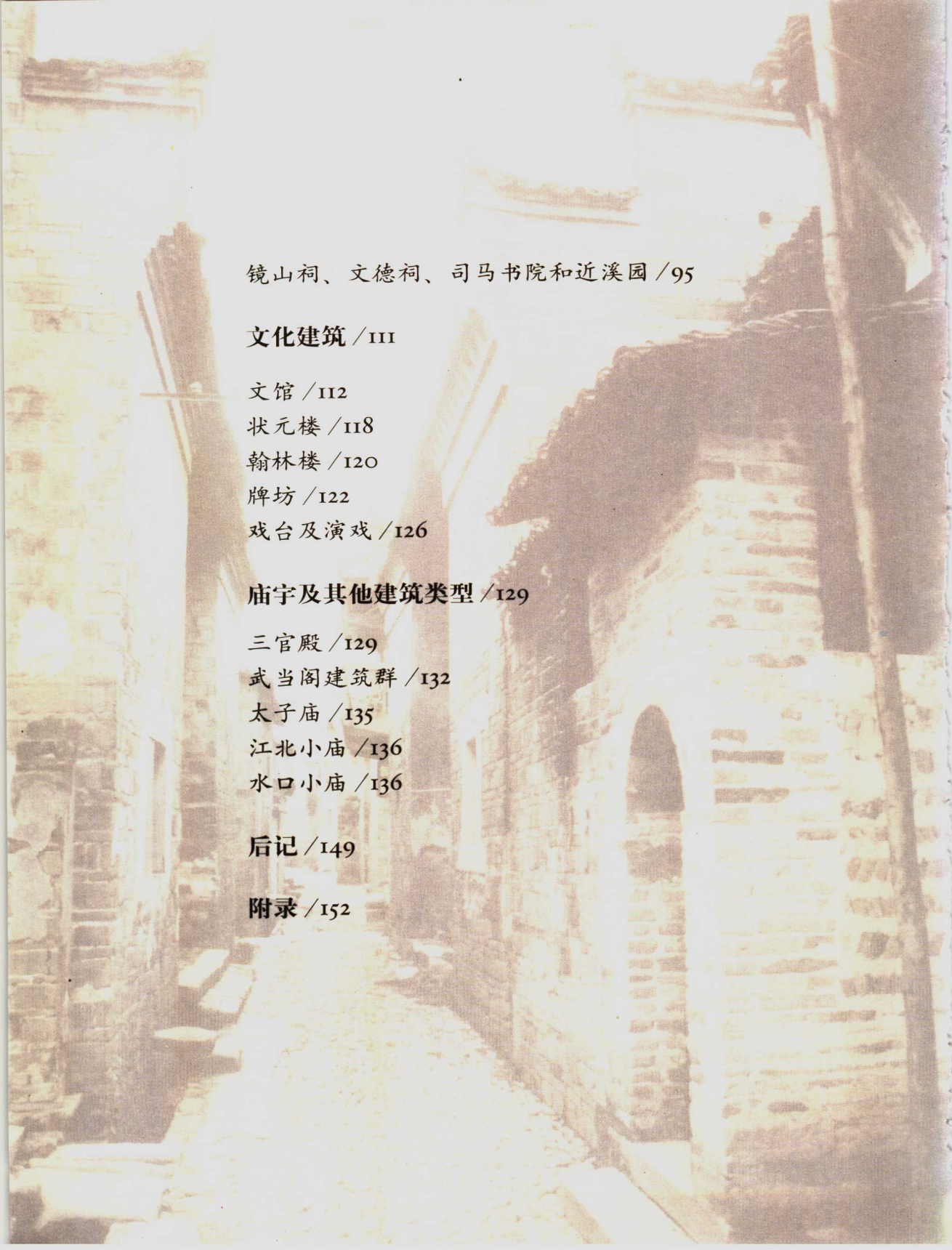
宗庙建筑 / 79

董氏大宗祠 / 80

分房祠堂 / 83

分祠的形制 / 90

宋赠屯田董公祠 / 93



镜山祠、文德祠、司马书院和近溪园 / 95

文化建筑 / III

文馆 / II2

状元楼 / II8

翰林楼 / I20

牌坊 / I22

戏台及演戏 / I26

庙宇及其他建筑类型 / I29

三官殿 / I29

武当阁建筑群 / I32

太子庙 / I35

江北小庙 / I36

水口小庙 / I36

后记 / I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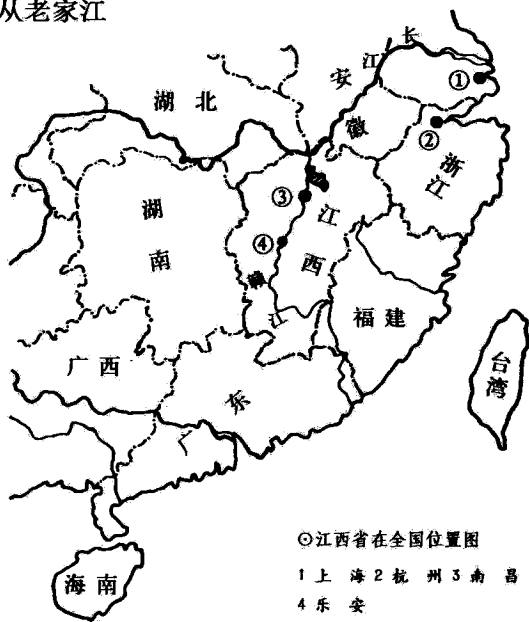
附录 / I52

这样一个流坑村

1636年，明末崇祯九年，大旅行家徐霞客从老家江阴出发赴江右（今江西省）考察山川地形，风土人情。他一路风餐露宿，每天都记下笔记。冬至这一天，他来到乐安县的云盖乡，经增田，过药腊，就到了令他惊叹不已的流坑。这一晚，他的日记中描写流坑村的文字占了大半，其中有句“其处阗阗纵横，是为万家之市，而董氏为巨姓，有五桂坊焉”，高度概括了明末时的流坑村：人烟稠密、村落整齐、商业繁荣、建筑多样，以及被流坑村董氏家族最引以为骄傲的一门五进士纪念碑——五桂坊。

仔细阅读徐霞客《江右游日记》，这位大旅行家一路经过了几百个村镇，但花费如此多的笔墨，并给予这样高度评价的村落，只有流坑村。

今天的流坑村更加珍贵。如果我们重走徐霞客江右之行的路线，就会看到当年他所经行的几百个村镇不是完全埋没，就是面目全非，惟独流坑村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它现存明代建筑（含遗址）十九处，清代建筑二百五十余处，尤为难得的是，整个村落的整体规划，仍基本保持着明代中晚期的格局。徐霞客走后的三百余年，这个村庄真仿佛“凝固”了，它变成了一个活化石，一个古代农村宗族制度、科举制度、社会变迁、建筑技艺、民俗传统的博物馆。它是江西省文化历史的博物馆。从1989年8月就着手研究流坑村的周銮书先生对这座“博物馆”作了这样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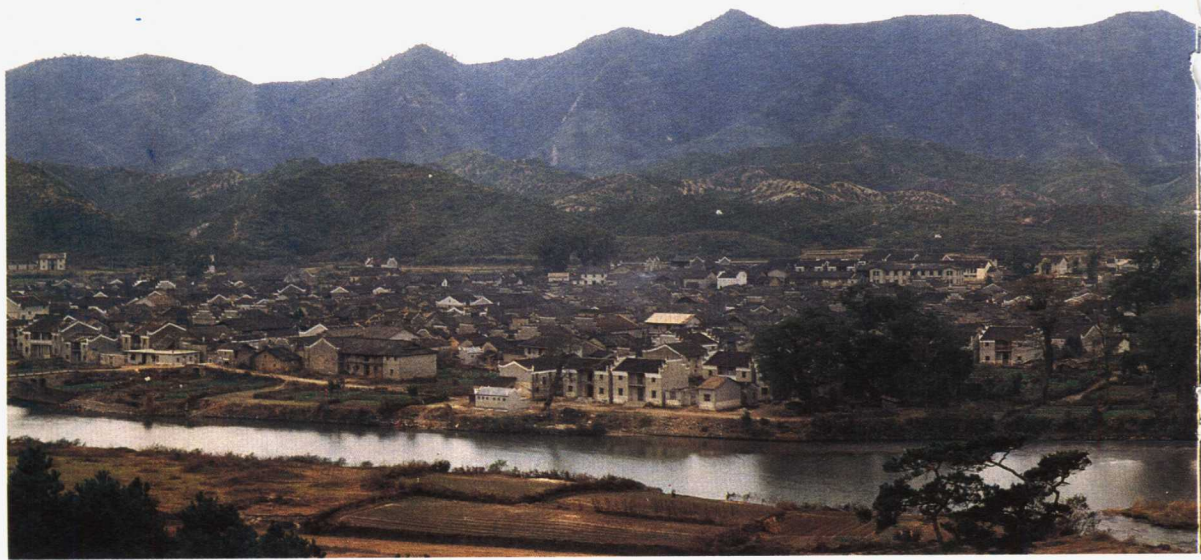


村子在乐安县的西南方，距离县城三十八公里，有简易公路直达村前。可是一进村门，不到片刻，就不辨方向，如进入迷宫一般。村子实在太大，没有两三天，不可能走遍全村。后来才知道村子占地约三点六一平方公里，建于五代南唐元年间（937年~942年），全村人主要姓董，自称是董仲舒的后代，一千余年，子孙繁衍，至今已有八百余户，四千多人。^[1]从宋真宗到明宪宗的四百多年间，全村有三十二人中进士，其中竟有一门五进士，还有一人中了状元，可见文风之盛。^[2]我们在村中穿街走巷，到处可见历代官宦绅商遗留的广宇大厦和纪念他们的牌楼祠堂。全村共有古代建筑近二百七十余处，其中牌坊楼阁二十六座、祠堂五十多座，^[3]匾额、楹联，内涵丰富，精致典雅。诸如“树德堂”“务德堂”“九德堂”“继德堂”“安义堂”“肇修堂”“守正堂”“里仁门”“虔仁门”等匾额，反映了董氏宗族对道德规范的重视。据粗略统计，全村现存木匾约一百七十余副、墙匾二百五十多副、楹联一百多副，许多联匾出自名家之手，如宋代朱熹，明代杨士奇、金幼孜、罗洪先、聂豹、谭纶、曾同亨，清代董士标、刘绎等。特别是“救命”“状元楼”“宋少师长清开国男董梦授先生祠”“翰林楼”“理学名家”“龙章世锡”这一类题匾，或年代久远，

[1]周先生自注说明：流坑村面积三点六一平方公里，是个大概的数字，还未经过精确的测量。全村现拥有耕地三千五百七十二亩，山林五万三千四百亩，人口四千二百九十人，八百二十户。由于村庄太大，历来统计难以准确。

[2]三十二进士中董姓者二十七人（一人为恩赐同进士出身），曾姓者四人，另一人为何姓。一门同榜五进士与状元均为董姓。明宪宗之后因转而商，不再有进士。

[3]据刘丹调查，今存宗祠六十二座。（见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硕士论文，2000年）



或名声煊赫，或金碧辉煌，充分显示了流坑昔日的尊荣。至于木雕、砖雕、壁画、彩绘等艺术作品则举目皆是。这一切使我们感到流坑的文化积淀甚为深厚，可以说是古代吉、抚两州文化的代表，江西古文化的缩影。^[1]

[1]《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这里还可以对周先生的描述择要稍作补充。一、据《千古一村》，江西省有三十名以上进士的村子，还有奉新县的华林，吉安县的秀川和南丰县的曾家等，但这几个村子都已经没有多少文物遗存，惟独流坑村基本上保持了明末清初的原貌。现在的新建房屋还没有明显地破坏村落建筑的历史信息。二、据董氏明万历十年（1582年）族谱，流坑村有大小宗祠二十六座，书院学馆二十六所，道光庚寅年（1830年）族谱则记了八十三座宗祠，二十八所书院学馆。三、据1989年新编《乐安县志》，流坑董氏历代共有刻板著作三十余种，有数种被选入《四库全书》。四、在北宋，流坑董氏仕宦辈出，与临川籍的梅圣俞、王安石以及庐陵人周必大等学者名臣交往密切，有诗唱和。五、元代理学宗师抚州崇仁人吴澄在至顺年间为《云盖乡董氏族谱》所写的序中说：“（江西抚州）宋三百年间，一家一族儒宦之盛，乐（史）、曾（巩）、王（安石）、蔡、晏（殊）五姓为首称。爵位之崇，

◎流坑村全景图





◎乐安流坑

王、曾、晏最，乐、蔡次之。科名之稠，曾、蔡、晏最，王、乐次之。乐安云盖乡之董，计其科名，多于曾、蔡与晏；校其爵位，亦在乐、蔡之上……通抚之六族而论，仕宦之众莫之与伦，至于今从事词章者不匮……六族之儒科仕宦则均，而惟南丰曾氏、荆国王氏可以当。”

六、董氏拥有大量田地山场。明清时期，与全国同步，流坑工商业经济繁荣，成为徽帮、晋帮、江右帮三大商帮中江右帮的一部分。主要经营的是竹木生意，外加蓝靛和夏布，也参与漕运。财富大量积累，土木之功达于至盛，现存的流坑村便是这时期的建设成果。

七、现今的流坑，在宋代是相距很近的流坑和板桥（又称桥西）两个村子。板桥主姓为曾姓，南宋时始迁祖曾丰是位大学者，有著作《樽斋集》问世，收入《四库全书》。他创办西山书院，南宋名臣、理学家真德秀便是他的弟子。板桥还有一位元代进士何淑，也有著作数种。现在流坑已经没有何姓后裔，曾姓也只剩两户了。

流坑在清末衰败，现在已经很落后很贫穷了。但蛛网和积垢掩盖不了它过去的辉煌，侵蚀不了它的历史价值，我们希望在周銮书等几位学者之后，从我们建筑专业的角度，继续研究这个难得的标本。



流坑村历史文化的大环境

流坑村的文化史，是江西省文化史的缩影。为了了解流坑村，我们先看一看江西省，看了江西省的历史，我们便大致能够明白，流坑村的兴起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便能够明白它的兴盛和颓败的原因。

江西省曾经是我国一个很发达很先进的省份。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自两汉逐渐加快。到西晋末年，中原人士大量随晋室南渡，除了北方战乱之外，原因之一便是包括江西在内的江南地区具有很好的开发前景。交通运输，是经济开发的重要条件，古代交通运输，最有效的是利用内陆河流。隋代开通了大运河之后，长江以北的南北水路运输有了很大的改善。而长江以南，南北运输，则以溯赣江而上过梅岭后再顺滇水而下广州为最便利。唐代开元四年（716年）开通了穿越梅岭的驿道，“坦坦而五轨”，沿途设凉亭、饭店、客栈，连接了赣江上游的大庾和滇水上游的南雄，解决了江南到广州的交通运输问题。江西作为南北交通的枢纽，经济很快繁荣起来。本来很偏僻的大庾，到宋代，章江码头上经常停泊着大量船舶。明代在东海岸沿线实行海禁，只留下一个广州作为开放口岸，于是赣江更成为繁忙的通道，把整个江西的经济带动到了全国前列。制瓷、造纸、纺织、冶炼、印刷等手工业都迅速发展，随着出现了一批工商业市镇。

流坑村身边的乌江古时四季可通舟楫，乌江在吉水注入赣江，与吉水相邻的吉安当时是繁华的商业城市，于是流坑董氏，便渐渐疏远科名，到明代纷纷投入工商业。流坑所属的乐安县，纺纱技术居全国领先地位。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载，手摇纺车一般只容三维，“间有容四维者，江西乐安至容五维”，以致赞叹“智巧日穷不尽”。流坑人生产并贩运夏布和靛青，与这种情况大概会有关系。不过流坑人最大宗的经济活动是“靠山吃山”，贩运竹木。农田面积已



◎流坑村东北乌江转弯处环境

经接近现在水平。农业技术、淡水养殖都有很大进步。

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外贸易的中心，紧接着修通了京汉、粤汉铁路，赣江失去了作为长江以南南北交通运输大动脉的作用，于是江西省的经济便衰落了。

从唐代起，随着经济的繁荣发达，江西的文化也繁荣发达起来。早在初唐，王勃在《滕王阁序》里就称道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唐代第一流的文化名人几乎都到过江西。宋朝提倡教育，改善科举制度，宽容文人学士，是江西文化的鼎盛时期，领先全国长达三百年之久。在散文领域，唐宋八大家中，有江西人欧阳修（1007年～1072年）、王安石（1021年～1086年）、曾巩（1019年～1083年）三人，占北宋六家的一半。王安石与流坑董修相友善。诗歌方面，除了欧、王、曾之外，有黄庭坚的“山谷体”，有曾几（1084年～1166年）、汪藻（1079年～1154年）、周必大（1126年～1204年）等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还有杨万里（1127年～1206年）的“诚斋体”。宋词的“四大开祖”中除张先外，晏殊、晏几道、欧阳修都是江西人。南宋鄱阳人姜夔也是词中巨子。元代编纂史学巨著《文献通考》的马端

临（约1254年~1323年）是乐平人。到了明代，文人仍然不少，最著名的则是大戏剧家临川人汤显祖（1550年~1616年）。

江西也是宋代理学渊藪之一。陆九渊（1139年~1193年）便是抚州金溪人，他和朱熹互相辩难的“鹅湖之会”便在江西铅山举行。元代有理学宗师吴澄（1249年~1333年），明代则有解缙（1369年~1415年）。更重要的是王阳明（1472年~1529年），他籍贯浙江，但他的学说却是在江西任巡抚的四年半中成熟的，所以王阳明死后“江右王门”最盛，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说“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阳明之道赖江右而得以不坠”。流坑村南宋的董德修服膺陆学，明晚期的董燧则醉心王学。“江右王门”中的聂豹（1487年~1563年）、罗洪先（1504年~1564年）以及浙江的阳明弟子王畿都和董燧交往很多。这时候又有“出乎理学之类而又逃乎理学之外”的泰州学派。

明代江西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宋应星（1587年~1664年），他生逢明季末世，虽然朝政腐败，但社会工商业的发达前所未有的。为适应商品经济的要求，宋应星力倡朝廷采取措施，促进商品加速流通。他于崇祯十年（1637年）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农业和手工业的科技全书《天工开物》，总结了当时工农业的成就，加以推广。

江西也是全国最有成绩的科举大省之一。宋、元、明三代科名都在各省前五名之内。两宋时期，江西省有进士五千四百多位，有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和文天祥等杰出人物。明代有三千三百多位，有解缙、杨士奇、况钟、谭纶、宋应星等。两朝在一甲三名之内的至少有七十位以上，文天祥便是状元。这些数字在全国都位居前列。科甲盛，仕宦也盛，江西籍人物在《宋史》中有传的超过二百二十人，部院大臣三十多人，宰相、副宰相二十多人，除少数几个外，都从科甲起家，其中出身进士的一百二十多人。《明史》中有传的江西人近四百位，其中部院大臣五十多人，宰辅近二十人，只有几个不是出身于科甲。清代，江西科举上失去优势，有影响的人物也稀少了。进士一千八百多人，包括鼎甲二十多人，都不见出色。

流坑村历史就是在江西省的大环境中展开的，它与江西的历史保持着同步关系，脐带连着这块红土地的胎盘，汲取营养。

宋明两朝，江西的文物人才比较多地集中在抚、吉二州。抚州称临川文化，代表人物为晏殊父子、王安石、曾巩、陆九渊、吴澄、



◎“理学名家”木匾



汤显祖、谭纶等；吉州称庐陵文化，以欧阳修、胡铨、杨万里、周必大、文天祥、刘辰翁、解缙、聂豹等为代表。流坑村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前属吉州永丰（即庐陵），十八年划归抚州乐安。它在吉州之东，抚州西南，庐陵文化和临川文化之间，所以虽然没有产生欧、王那样的杰出人物，却也算得上人文荟萃的文物之乡了。流坑的乌江经永丰到吉水入赣江，它和吉州的关系一向比较密切，所以，古人把永丰称为“欧董名乡”，董便是流坑董氏。^[1]

[1]见《千古一村》第三十二页

在临川文化和庐陵文化的强势影响下，流坑村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上层雅文化远远压过乡土性的民俗文化，并迫使明清两代的商人们没有充分发展出有市民特色的文化。至今乡民们津津乐道的还是村中心董燧旧宅大门上的一块匾：“理学名家”。

“崇本抑末”的上层文化传统甚至阻碍了流坑村的经济的发展。